

关于新方志学建设的若干设想

1993 年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修志盛事。展出 80 年代以来新编省志、市志、地区志、县志及各种专业志、年鉴等达 2000 余种，约计达 1 亿余字。我从事本届方志工作屈指也有 15 个年头，如今书房里堆满了各类方志，朝夕相对，经常翻用，得益不少。面对如此丰富众多的各类方志，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志书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编纂出来的？各类方志的内容如此丰富和方志理论相对贫乏又是多么不相称。把称得上科学的新方志学的建立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恐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一、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回顾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难以扯清的问题。同样，没有修志理论，何来如此众多的方志成果；可是完整、系统的新的方志理论始于何时，如今又在哪里呢？它的标志是什么？这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回顾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80 年代之初，编纂新方志工作在各地启动。我自告奋勇“自投罗网”走到修志第一线，担任浙江省地方志学会的会长（当时并无其他修志机构），又担任了第一批修志县的顾问，在实践中学习，反躬自问，靠什么理论来指导各市县修志工作呢？应该说当时还没有一个明确、完整的新方志理论来指导。有的是：

第一，查阅旧方志的编纂方法和章学诚等的修志理论。章学诚

提出的‘乘二便 尽三长 去五难 除八忌 而立四体 以归四要’等虽非金科玉律，却常常用作参考。但更多的是查阅旧的体例和当时出现的少数新方志编目，同时也查考有关论著作为参考。

第二，多年来从事理论工作的习惯，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修志的一般指导。如在统贯古今问题的处理上如何区别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事物的不同性质、不同情况 在是与非的问题上如何坚持正确的标准；在成绩和缺点问题上如何坚持一分为二；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上如何作正确表达；个人的作用又如何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记述等等。

第三 将从事各项工作的经验 引用到修志中去。如编辑工作、理论工作、研究工作、教学工作等。上述工作虽然与修志工作不同，但隔行不隔理，都有可以吸取的内容和可借鉴的东西。当然十分警惕不能盲目套用，以免弄巧成拙。从上所述 说明当时没有理论指导修志是不确切的；说已经有一套明确的方志理论，同样也是不确切的。只能说当时方志理论是模糊的 可以说是一种‘模糊理论’作为指导。

“模糊理论”在明确的新方志学理论建立以前出现 是正常的，合理的 也是有益的。新方志毕竟是老传统 又是新学问。正因为“模糊”就可能有较大的可容性 容纳各种正确的、合理的意见 避免过早定于一尊 铸成一法 避免框得过死。“模糊理论”也优于没有理论 以免修志中各行其是 随心所好 修出不像志的教科书、学术论著、新闻特写、总结报告之类 将修志引入歧途。

当然 这种“模糊理论”也会产生一些弊端。第一 由于理论指导的不明确，对志书的编纂出现不同的要求和结果。也会助长一些左顾右盼，照抄照套的现象，影响志书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反映地情 削弱了它的实用价值。第二 影响修志队伍的建设。本届修志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经历和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在修志过程中 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争议 有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甚

至各行其是 相互扯皮。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面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使工作少走弯路。

第三，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方志学的建设就会不得要领。多年来方志学始终处有一种不定型的状态之中，似有若无，这是与理论匮乏分不开的。

经过 10 余年修志实践，大量志书已经出版，关于方志理论的论文、专著也已先后问世。瓜熟才能蒂落“模糊方志学”的时期应该成为过去！方志学真正成为一种新的学科的时机已经到来。

二、应该确立新方志学这门学科

传统地方志在历史文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地方志的编纂在中国源远流长，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旧方志达 8264 种，占我国整个古籍的十分之一。其实不止此数，在新编地方志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不少散失的旧志书。在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中都收藏了大量中国方志，并备有详细的目录。在编纂大量志书的同时，不少著名学者如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纪昀、洪亮吉、孙诒让、梁启超、王葆心等，对方志的源流、性质、特征、效能及编纂方法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有的通过序跋、例言、书信、争议、专论等表达了修志思想、理论和方法。尤其是章学诚总结前人编撰方志的得失，深入探讨方志理论，建立方志学的体系，成为方志理论的奠基人。

那么，时至今日，新方志学是否已经确立？建立的标志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已经说过，当前不能说尚无新的方志学，也不能说已经建立精确的方志科学，只能说正在由“模糊方志学”向精确方志学的过渡阶段。

10 余年来出版的新志书仅省、市、县三级已达 2326 部，其他各类志书肯定远远超过此数。而方志学的著作，有辞典 2 部，专著几十种，但是大都是方志编纂方面的论著，系统、完整、深刻地论述方志理论的诸方面的专著实在太少。

回顾本届修志之初，新方志学的建设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有的主张史志不分，不承认方志学，主张用修史来代替修志。经过多次探讨，分析史和志的联系和区别，才将方志从地方史中分离出来。地方志史志协会也才正确定名为地方志协会。无疑这是一个进步。

有的认为新方志可用章学诚等方志学家的理论，不必再有什么新的理论，因此言必称实斋，似乎舍此无他。当然章学诚等旧方志学家的理论是应该认真学习、借鉴的，可以说现在我们钻研得还不够。但时移世异，本届修志已经明确并非简单的续修，而是新修。在科学发达、事业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事物的分类、方志的内容和记述方法等与乾嘉时代有极大的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章学诚的在天之灵确实难以解决今天方志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是不必苛求于我们浙江的先贤的。

也有的同志主张用地理学来代替方志学。曾设想可以用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来编修新方志，既然可以如此，当然就不必再建设什么方志学了。这种意见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毕竟是站不住的，后来为方志界所摒弃。

也有的同志主张将方志分别解剖，分别加以指导。如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修经济部类；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修社会部类；用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修地理部类；用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修政治部类等等。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如修志应该吸收各方专家的意见，但从总体来说，如此这般一部方志将成为一种难以统一的大杂烩，是不可行的。

也有的认为修志主要为了“资政”，主张新方志应属于行政管理学。这种意见也经过争议而被否定。

还有一种主张，本届修志是党委领导、政府修志，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历次党的重要会议为指导，不必再有什么其他理论为指导。这话当然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原则不能代替具体。理论不仅要有科学性、指导性，还要能解决修志中的实际

问题 具体问题。

既然别的学科不能代替方志学科，新方志学就应该在众多的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修志的志士同行，不少人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 情况也有些好转 但仍忧喜参半。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1、新方志论文在方志刊物中刊登不少，但在全国性的重要学术刊物和国外学术刊物中刊登甚少。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极少刊登新方志论文。每月一期的《新华文摘》摘登各门学科的论文，却极少见到转载、摘登新方志学术论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新方志的渐有发现。如日本《东方》以显著位置专文介绍 80 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一些新方志，谈及浙江的就有《慈溪县志》、《龙游县志》、《海盐县志》3 部。可是，对关于新方志论文的介绍却十分罕见。

2、国际、国内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很少有方志工作者参加并宣读学术论文。1990 年 8 月笔者曾主持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乘机有意识地发表《越文化研究和方志编纂》的长篇学术论文，虽引起一些注意，后收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但影响还不大。在“江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桥驿作了《中日两国地方志比较研究——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编纂》的学术报告，但此类活动为数尚太少。以浙江而论，对外学术交流甚多，可是关于方志学的交流少得很不相称。

3、关于新方志理论专著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一些，多数是结合实践写出来的，但为数不多，有重大影响的更少，受到学术界和方志界大多数公认的权威（理论需要真正的权威）之作，并能有效地指导修志实践的，恐怕还没有。

上述三种情况说明新方志学尚处在一种尚未引人注目，而且人言言殊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责怪学术界、出版界不重视对方志理论的推广和宣传；也不能苛求方志工作者一手抓好新志书的编纂，一手抓紧新方志理论的建设。这种“两手抓”是难以做到的。如今，不少地方本届志书已经出版、发行，可以腾出手来，同时又积累了

10 余年来修志的经验，新方志学的建立应该是时候了。尤其是应该成为方志学会的重头戏。

三、关于新方志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1、什么是地方志？它的发生和作用是什么

地方志简称方志。《中国地方志辞典》称：“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著述，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中国方志大辞典》称：“它是以地域为单位（主要是行政区划）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方面的书籍。”

《辞海》（1989 年版）称：“方志记述一方事物的志书。”

近年来不少论文对“方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里不一一抄录了。以上三种辞书的解释，各有所长，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疏漏，就是说方志只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只记“一方事物”，忽视记人、记人的活动。我们承认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是历史创造者，为什么又偏偏要在方志中忽视它。其实近年来新出版的志书对人的活动，包括人物传、人物录等以及以事传人、以人传事，已给予充分重视，并成为志书的重要内容。这里不能不说方志的理论概括的确落后于修志实践。为此，我认为对“方志”的解释应明确包括“一定范围（地域）”、“一定内容”和“一定的体例”。

什么是方志的性质？讲清性质重要的是要区别相近的事物，否则就易混同，难以显示自己的特色和存在的理由。与地方志相近的书籍有“地方史”、“地方百科全书”、“地方辞典”、“当代中国（地方卷）”等等。

省、市、县志都是资料性的著述，都是用方志体例来表现的著述；这种著述需全面系统记述一定地域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种著述，不同于个人的著述，一般来说是具有官方性的学

术著述。这种著述具有历史继承性，需要按时持续进行。几年前我有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工作条例’（讨论稿）的起草，《条例》的提法：“地方志书是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应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种表达基本是合适的，但似应补充两层意思：一是地方志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编纂的；二是需要持续定期编修的。

2、方志的功能和作用

方志的功能最常用的概括是六字诀，即“存史、资治、教化”。应该说此六字概括是相当精炼、明确的。对过去的时代和旧的方志来说是十分适用的，对一代新志也可借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处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文化活动常常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越境发展。地方志书详记一地的历史和现状的方方面面，对于了解情况，开展经济交流，文化活动等等都具有切实的作用。地方志实际上已成为国内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这是时代造成的。为此，在“存史、资治、教化”之外，似应加上“交流”二字。

《条例》讨论稿提出“地方志”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于向各族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可增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祖国的认识 and 了解。”是比较完善的。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地方志提供了一个地方的基本地情资料，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各项研究工作不能离开的基石。

3、方志学的定义和基本内容。

方志学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梁启超曾经明白地说过：“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今天距实斋时代已经过了 200 多年，方志学的确立这一点恐怕没有很大的争议了。什么是方志学？有以下几种表述：

“方志学是一种专门研究方志领域中所特有的运动形态的学科”【《方志学概论》】

“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地方志领域中特有的运动形态,即研究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中国地方志辞典》)

“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的产生、发展、性质、价值、编纂体例及其演变的一门学科”(《中国方志大辞典》)

《辞海》并未设“方志学”这一条目。

上述三种不同解释其共同的点就是方志学研究的对象是地方志本身。这种表述应该说是正确的。可是进一步研究一部地方志成功还是失败,固然有观点、体例、资料、文字等等方方面面问题,可是其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正确反映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即能否正确反映当地的地情。地方志又不是简单地资料汇编,而是一种资料性的著述。为此,地方志的编纂者在编纂方志时,离不开对当地地情的研究。方志学除了研究方志本身之外,还要研究方志所记述的当地基本地情,研究基本地情与方志记述的正确关系。因此,我认为方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

关于方志学的内容,现在已有不少论文、著作作过详细论述。简而言之,应该包括“方志理论、方志源流”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广,我们仅对浙江的方志源流作了研究,就写了一本 17 万字的《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方志种类、方志编纂、方志应用、方志学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历代著名方志学家等,还应该附录历代政府有关方志的文献。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四、关于方志学建设的建议

本届修志已历 10 余年,动员了成千上万人,方志学的建设应该是众多修志人员的经验上升、飞跃,而不是靠个别人苦思冥想所能完成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组织、领导。理论落后于实践是常有的事,但希望不要落后得太久、太远。正如家驹同志所说:“希望下届修志时,不要开口还以章学诚理论为指导。”(大意)为此,提出几点建议如下:

1、收集、研究近年来已经发表的关于方志学理论建设的论文、专著，研究其得失，必要时可进行一次评奖，评出优秀论文、专著，吸取其中的有见地的观点、论述。也可以择其要者，如选几本方志学专著，聘请专家进行座谈、评论。总之，一定不要割断方志理论研究的历史。

2、编辑一本中国新方志联合目录（虽未出书，但已定稿的）均可收入，明确范围，确定体例，精心编纂。同时编一本新方志学著述目录，以供查考。

3、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举行一次本世纪方志工作回顾和下世纪展望的座谈会，从宏观上通过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

4、由地方志指导小组或中国地方志协会牵头，聘请有关人员编写新方志学大纲。鉴于目前已出版若干部此类书籍，千万不能再作一般水平的重复，也不宜只作一般性的修修补补。因此，对该书要提出明确要求，然后制订编目，组织有研究的人员分头撰写，形成初稿，再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反复，最后定稿，作为本届修志的一项共同成果。

（魏桥）

方志理论研究的现状及改革的思路

新编地方志已经 15 年，目前全国各地的志书编纂工作陆续进入了审查和出版阶段，大批新方志成果相继问世。伴随着这 15 年大规模的修志实践，新方志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及

时地分析当前方志理论研究的动态 肯定成绩 找出问题 提出改革的思路 对今后方志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

50年代末期 配合当时的“大跃进”全国许多地方筹备和开展了方志编纂活动。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 编修方志的目的在于进行宣传教育、提高阶级觉悟 因而内容以新旧对比、忆苦思甜为主。而且由于仓促上马、草率成书 故此次所修多为废品。方志理论研究亦未及展开。

7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统一部署下 全国上下开始了第一代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编修。新方志理论研究也随着编修实践逐步开展。笔者认为 在1985年以前，方志理论研究处在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开展向社会介绍和普及方志常识 简述历代方志发展史 评介传统志书名篇佳构等基础性工作。部分编修工作开展得较早的地区 也逐渐开始了新方志编纂方法和技巧方面的研究。

1985年至1989年 新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在这一时期 新方志的整个编修过程 包括从篇目设计到层次划分、从资料选择到史实考辨、从总纂合成到审稿校印 的各个主要环节和方面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对具体编纂业务工作起到了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同时 新方志基础理论研究也进展甚大 方志学性质、体系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讨论得比较充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引进和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 从新角度来研究方志理论问题 虽不无可议之处 但立意新颖 观点独到 令人耳目一新。

1989年至1992年，全国各地的新方志编纂普遍进入总纂和出版的高峰期，各级政府对编修工作有克期要求，时间紧任务急。而许多有研究能力的人又具体担负着繁重的编纂任务，无更多的

时间精力顾及理论研究。也由于受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局限，许多具体的编纂业务问题已被炒透，相当数量的文章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有一定抽象度、有一定理性思辨、有新意有份量的成果甚为少见。因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方志理论的研究明显滞后于编纂实际。

1992年以后，各地修志陆续进入了出版发行时期，在志书编纂完成后，相当一部分有研究能力的编纂者从繁重的编写中解脱出来，对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使有关编纂方法和技巧方面的研究论著骤然增多，质量也较以往有所提高。随着大批志书的问世，有关评介文章也占据了相当比例。方志基础理论研究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且研究的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理论性更强。

二

根据对近二三年全国省级方志刊物所载有关方志理论文章所作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方志理论研究的主要的内容和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方志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要而言之，目前关于方志学性质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派别：第一为传统派，主要有志属历史和志属地理两种观点；第二是新兴学科派，这一派引入现代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把方志学归属于社会科学门下，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或边缘学科。这一派的观点甚多，主要有“地域百科全书”、“行政管理书”、“地情资料书”、“区域发展研究书”等等观点。

上述两大派争论的焦点在于方志学能否独立于现代社会科学之林；方志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还是某一独立学科（如历史学或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当然上述观点主要是方志界人士的看法。事实上，社会上对方志学的看法并非一致。以全国几家具有权威性的刊物为例，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在1992年以前，有关方志理论文章归入“历史”类中的“地方史”或“民族

史”小类。1992年后在“历史”类下设立了“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志学”小类。《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版)在“K历史、地理”类中的“中国史”小类下设“地方史志”栏,下又设“方志学”、“各代总志”、“各省市区史志”三小栏。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将有关方志论著归入“地理”大类中的“中国区域地理”小类。《中国史学年鉴》则把方志学归入“历史地理”类中。凡此等等,虽划分方法各有不同,但均未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这一点值得方志界人士深思,要使方志学真正独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尚需长期艰苦的努力。

2. 方志学的学科体系问题 近几年,方志学的学科体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当然,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承认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此前提下探讨方志学应包含些什么分支,这些分支研究对象和范围又是什么等等。目前人们的看法还不尽相同,但已经通过探讨获得了大致的轮廓。只要继续研究,就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演化。

3. 方志编纂方法和技巧 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发表的研究论著数量最多,涉及面也最广,包括组织发动、机构人员、篇目设计、资料收集、编纂加工、总纂合成、审稿修改、出版印制等各个环节。据统计,这方面文章约占全部研究文章的75%左右。由于数量巨大,水平也参差不齐,亟待进行系统的整理。

4. 方志应用研究 方志与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相比,“致用”是其显著的特点。方志应用问题是值得人们探讨的重要课题。近几年,方志界已有人着手研究方志如何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包括方志机构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但多数文章仅仅停留在某几个具体的“致用”实例上,未作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超出所举实例所涵盖的就没有普遍意义。这是今后方志应用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与方志应用问题相关,有人对“资治”、“教化”、“存史”六字功用说提出了异议,认为方志的功用在于提供地方信息给读者认知。而

读者如何接受方志提供的信息，接受的程度怎样，都值得人们去研究。

5. 方志主体与客体问题研究 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已有少量文章发表，内容也还有待于深入。笔者认为，一切方志著述都是主体化了的地方信息。主体化就是主体（编纂者）根据自己对客体（地方）的认识而进行的记述。因为编纂者在认识地方的过程中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指导下，怀着某种情感去观察、认识地方，故而纯客观的、不带任何倾向性的记述是不存在的。也正是因为经过了编纂者的加工，方志所记述的内容就与真实的地方存在不会完全相同，甚至会很不相同。当然由于方志所记述的大部分内容是以编纂同时代的地方事、物、人为主，这就决定了方志所记必须与当时当地的客观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否则就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同。另外，方志主体与客观的关系、主体意识对方志编纂的影响等问题也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6. 方志的思维学问题 目前，已有人运用思维科学对方志理论进行研究并获得了一定成果。如关于方志的抽象与具象问题，有人认为方志抽象可划分为编纂者抽象和读者抽象两个不同的范畴，各有其特征和作用，只有把握好它们对方志的详略、篇幅等的探讨才会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又如，方志的宏观与微观问题。有人撰文认为不同层次省、地、县的志书其宏微概念所指有所不同，而同一层次志书的宏微问题研究，则有助于方志内容的深化。再如，方志的综合归纳与分析演绎、方志记述中的思维形态等问题已有人涉及。另外，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角度对方志理论探讨，研究编纂者的思维逻辑、方志书的内在逻辑、读者人的接受逻辑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尽管数量甚少，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但其观点独特，角度新颖，标志着方志理论研究开始进入了理性的思考。

7. 方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研究 作为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地方性文化产品，其时代其社会其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然

灾害，均会对方志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是通过志书本身反映或折射出来的。这就是人们所谓之方志的时代风格或社会风格或地域风格。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成果寥寥，只有个别文章涉及于此。

8. 引进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巧进行研究 近些年，已有相当一批文章把系统科学、社会学、统计学、文化学、现代语言学甚至社会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巧引入。尽管有的文章尚有待充实，有的观点和提法不免故弄玄虚，但就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巧来说，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它不仅使学术空气比较沉闷的志坛增加了几分活跃，也给方志理论研究突破传统模式带来了可能。如，有人开始用泛文化学的方法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方志文化，跳出了就方志论方志的老套路，把方志置之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把方志学家作为传统文人中的特殊群落进行研究，极大地开阔了研究的视角范围。另外，还有人运用现代语言学，对方志的语言氛围、语言环境、文体、修辞乃至语法、句法、词法进行探讨 颇显其功力。

9. 方志批评问题 就书评书的评介模式，在修志初期确有必要。因为 如果没有一个评介的标靶 就会使批评陷入空泛。但是，如果仅仅是就书评书 仅仅是观点、体例、资料、文风等几个方面的套语式评介，就不会有真正的方志批评，或者至多是浅薄的批评。目前，已经有人呼吁方志评介文章应该在理论上升华，应该在具体的方志评介中增加更多的思辨色彩。的确，没有思辨的批评不能算真正的批评，而没有真正的方志批评，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是很难确立的。

10. 新方志 质量问题研究 随着新方志的大量出版问世，质量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最近几年关于质量问题的研究文章骤然增多，其中有方志界人士的文章，而其他高校或科研人员的文章也占了很大比例。这表明新方志的质量问题，不仅在方志界内部，而且在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质量问题的研究文章主要分为

两类：一是分项式研究，就新方志的体例、资料、文字等各个具体层面上的质量问题进行探讨；二是综合性研究，即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对新方志的总体质量作分析评估。《中国地方志》在最近几年连续刊发了几篇有份量的质量研究文章，对各地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1. 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研究 15 年来，经过方志界的共同努力，在社会各界，主要是有关高校、研究所的协助下，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其具体表现是：①以省市区为单位的历代方志数量、种类、分布的基本情况已经搞清楚，编印了省市区一级的方志目录；②各省区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已基本理清；③方志学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常识性介绍转入专门化研究，如方志目录史、通志篇目发展史等。

三

据估计，目前全国有 10 万修志大军，专职修志约 2 万人。这支队伍是在修志实践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具有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具有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为新方志的编纂和理论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任何科研队伍一样，方志科研队伍在年龄结构上也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层次。如 1994 年《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纪要》所指出的：“50 岁上下的同志是目前修志队伍的骨干力量，也有 20 多岁、30 多岁的青年生力军，还有不少离退休的老一辈方志工作者。”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志研究队伍是方志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方志理论进一步繁荣的希望所在。然而，我们也应正视这样的现实，与其他科研队伍相比，方志科研队伍明显地存在着先天不足。虽说是 10 万大军、2 万专职，但除去行政、后勤、组织、领导等各方人士，真正能从事编纂和研究的人数则微乎其微。即使是能从事编纂业务的人员也普遍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未受过较严格的本专业的高等教育（全国高等院校中方志专业

极少)二是从事本学科专业研究的年限至多也只十余年(个别老一辈方志工作者除外)因而应该说从整体上看方志理论研究队伍还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素质尤其是研究能力)还不算很高。在修志任务陆续完成后的今天,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队伍的素质,是应该而且必要的。

在充分肯定方志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亦必须清醒地看到方志理论研究上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1. 基础研究薄弱 与社科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方志理论研究更偏重于实用性的编纂技巧方面,基础理论研究明显滞后。某些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因为未能直接诉诸指导实践而倍受冷落。故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至今尚未能突破。

2. 理论抽象度低 大多数研究论著微观有余,宏观不足,具体有余,抽象不足,因而立论不牢,内容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3. 系统完整性差 作为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成果就不算很多。而学科系统下各分支学科(方志风格学、方志人物学等)的研究更未成规模。相当一部分论著追求“大而全”,动辄就是把方志史(概况性的)搬到论著中,或者就是拼凑些“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等众所周知的套话作为文章。而许多专门性分支或专题却极少有人问津。

4. 研究氛围比较封闭 作为社会科学中一个规模较大的门类,方志界与其他学科的交往和渗透还不多,方志理论研究的成果(包括志书在内)的社会知名度还很低。就方志理论研究本身来说,还基本上处在“以志为主”的封闭式氛围中。如方志学性质、体系、功用等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型,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与社会现实有相当距离。

5.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未把握好 有的论著仅就某地某事某方法某技巧作微观论证,不具有普遍性,而另外一种倾向则是文章大而空,飘渺虚无,泛泛而谈,与编纂实际距离甚远。

四

根据上述对 15 年来方志理论研究发展历史及其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今后理论研究工作在思想上应把握如下方面。

1. 要更新观念 目前某些较为陈旧的观念在影响甚至阻碍着方志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官修’的观念‘方志万能’的观念‘为编而编’的观念‘为编而研’的观念等等。只有更新观念，立足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立足于使方志面向现代化、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方志理论研究才有可能得以突破。

2. 要拓展研究领域 目前方志理论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主要还是局限在对方志（书）本身的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领域或课题还很少有人涉及。譬如，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方志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中的方志，传统典籍中方志的地位等等都是值得人们深入探讨的。

3. 要深化研究层次 与大规模的“群众路线”式编纂实践有所不同，理论研究主要还是一种个人学术活动。因此，要想把理论问题研究深、研究透，要想避免研究成果肤浅浮躁，就要在方志界大力倡导‘坐冷板凳 吃冷猪头肉’的学风。当前方志和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承认度不高，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与我们的成果研究层次不高、缺乏应有的深度有关。

4. 建立交叉学科 方志内容涉及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涉及到许多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方志理论研究，吸收其他学科的优长，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来构筑新方志理论体系，建立交叉学科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已经有人将方志与区域发展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很好的尝试，值得大力提倡。

5. 要加强自我宣传 应该肯定，方志界的学风和研究风气十分朴实，但自身的宣传不够，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束之高阁，不被社